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6·

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

Unity Through Diversity

克莱斯·瑞恩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6·

Unity Through Diversity
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

[美] 克莱斯·瑞恩(Claes G. Ryn) 讲演
张沛 张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13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美)瑞恩著;张沛,张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6)

ISBN 7-301-04960-9

I. 异… II. ①瑞… ②张…③张… III. 人性—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690 号

书 名: 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

责 任 者: [美]克莱斯·瑞恩 讲演 张沛 张源 译

责 任 编 辑: 冯金红 张冰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4960-9/B·0206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www.pup.com.cn

电 子 信 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6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12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序

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大潮中，人类数千年来创造的文化多样性是否能长期保存，又如何得以保存和发展呢？有人认为西方建构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其普遍性和先进性足以成为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模式；又有一些人怀疑：那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呢？是否也综合于这共同模式之内而逐渐泯没以至最终消失，顶多成为旅游商品和广告呢？强调普遍性，会不会形成文化霸权？强调特殊性又会不会无法沟通，终于分崩离析？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发现古远的中国历史学家，《国语·郑语》中的史伯早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夫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强调“不同”，求“不同”的和谐共处，并指出不同才是产生新物的唯一途径，这正是中国传统的一贯追求。但如何与当前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却始终是我心中的困惑。

在这样的困惑中，我幸运地结识了瑞典学者瑞恩。其实，这结识亦非偶然。我在研究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同时涌向中国所形成的张力时，深感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号召的学衡派诸公确实对中西文化的会通独树一帜，起了不可磨灭

的历史作用；进一步追索，发现其学术渊源很得益于当时哈佛大学提倡新人文主义的欧文·白璧德教授，而白氏又是儒家与佛学的崇尚者，再进一步追索，发现当今美国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白璧德文化遗产的研究所，他们出版的专刊，就叫《人文》，主编则是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讲座教授克莱斯·瑞恩。

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和他见面，于是邀请他参加了1999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瑞恩发表了一篇精彩论文，题目是：“Unity in Diversity: On Cultivating the Common Ground”，会上会下，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多次对话，总觉意犹未尽。我非常高兴如愿以偿，终于能请到瑞恩教授来北大作一次较长期的讲座。这里出版的就是他讲座的主要内容。

在他的讲座中，瑞恩批判了那种企图按单一形象塑造世界的欲望，他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如艾伦·布鲁姆等称为新雅各宾派，指出他们和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一样，“不惜采取政治甚至军事行动，以便代全人类立言”，“他们漠视、憎恶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文化特殊性，同时鼓吹某种政治的霸权或垄断地位”，否认存在着他们自己的主观喜好之外的行为准则，从而贬损其他民族，将其视为异己的奴仆。另一方面，瑞恩也强调指出：“如果多样性未经人文的陶冶，如果它不是心系更高的生命，生活，而仅仅表达了武断、任性与怪癖，那么，它就会带来种种波动、反复，甚至更糟的后果”。正如艾德蒙德·伯克所说：“随意任性的人是不自由的，他们的情绪铸就了自身的枷锁”。当人类不再感到生命具有更加深远持久的意义，他们就会日益追求立即可以得到的满足，在转瞬即逝的

快乐中顺从最强冲动的驱使，而摒弃其他一切。

因此，瑞恩教授认为必须面向更高的生活，充分发挥人性，尽量提升生存的价值；同时，需要对人类的自私自大作出强有力的制衡；除了谦恭与克制，真正的相互尊重外，还需要有一种共享更高人性的意识，承认存在着一种能以多种形式出现的更高人性。这种人性深深植根于不同文化的土壤中，并获得其中最优秀成分的滋养。事实上，真正强大的文化体系也不会静止、僵化于某种固定的特殊模式之中，它必然不断发展自身，以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需要而成为普遍生命的原动力。这就是瑞恩所继承和发展的白璧德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在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观照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讨论了几千年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也得到了新的和谐和体认。瑞恩的讲座时时使我联想起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传统而得到新的启悟。

瑞恩教授的讲座十分丰富，当然远不止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的讲座所激发的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是广泛而深邃的，肯定会在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可惜这本小书无法尽载当时热烈的质疑和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乐黛云

2001年7月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前 言

2000年5月,我作为“杰出外国学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讲座,本书即在该系列讲座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该书的附录是一部专著,曾由国家人文研究所在美国出版发行。

《异中求同》一书就如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各个社会与文化内部及彼此之间要想和平相处,其道德与文化前提是什么。这本书代表了我从年轻时就怀有的一种愿望:在意识到世界日益缩小的同时,希望重新提出某些特定的西方传统,并尽己所能对其重新予以思考和补充。关于解决全球一体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这本书所用的方法与当前西方世界通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在我看来,不同文化、民族与个人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抵制道德与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我无意抛弃普遍性这个说法,但也不愿接受抽象模糊的普遍主义这个名词。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缩小的世界里,我们更是需要培养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与西方某些食古不化的哲学偏见正好相反,特殊性与个体性并不一定会损害普遍性,它们潜在地与普遍性不可分割而成为充实普遍性的源泉。

本书作者生于瑞典,长于瑞典,许多年前来到美国,那时还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生。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我的学术生涯一直在美国度过,但是我同祖国以及整个欧洲的联系始

终都很紧密。我长期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任教，但自己却是在一个清教国度里成长起来的。或许正是这些因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的兴趣。在处理这个哲学上的老问题的过程中，我受到了不同民族思想家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人艾尔文·白璧德，和意大利人本尼迪托·克罗奇。其他国家的思想家，特别是瑞典、德国和英国的思想家也对我的观点产生了影响，此外，还有非西方思想来源的影响。

一个瑞典人，生活在美国，折中吸取了英美与欧洲的思想，又被请到中国来，就道德与文化的问题发表意见，这似乎正是全球一体化的一个例子，而这种全球一体化掩盖了各个文化、民族与个人的显著特点。不过，在我看来情况绝非如此。在中国，我深深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西方特性，这种特性由于我的瑞典血统以及其他个人背景而更加显得突出，这种感受也就前所未有地强烈。然而，我又同时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确实存在着超越个人、超越文化的人类生活。我通过在中国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特殊性与普遍性是能够潜在地共存的。我强烈地意识到北京大学的东道主和听众们代表了一种古老的文明，同时他们又是这古老文明中最“现代”的一批人；不过，我发现这一中国特性并不会妨碍交流，而是激发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自我与人类。在我看来，人们接受和讨论这些讲座的方式表明他们是反对如下呆板观念的（这种观念目前在西方大学里颇为流行）：代表不同文化的思想与想像是不可能真正契合的。而与此同时，我的讲座以及听众对这些讲座的反馈均表明，只有在个人与民族的特定情况下才能讨论人类的共同基础。要知道，人们会对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

生的文明充满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一定会阻碍理解与欣赏其他文明。恰恰相反,我坚信只有保持这种深情,我们对共同人性的理解才不会流于浮浅。个人与民族间的真正理解与和谐必然关系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共存与整合。

能够应邀来中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做系列讲座,这是一种荣誉;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传统对学者的尊敬,这种荣誉就更为突出了。我的听众主要由研究生和博士生组成;这些人很快就会跻身于中国学术带头人之列,因而能对他们讲演是一种光荣,也十分令人愉快。我曾被提前告知,北大学生经常在讲座期间随意进退;由于我的讲座内容比较多,需要逐段地翻译,讲座时间难免会延长一倍,因而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结果讲座时根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受到了中国式的最佳礼遇。我首先为听众长期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而颇受感动,之后又对听众敏锐、深刻而坦率的提问与评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些教师和学生令我的北大之行非常舒适愉快,也很有收获。我感觉到,这些热情好客之举与乐黛云教授的热情安排是分不开的。我主要是受乐黛云教授的邀请来北京大学的,她全面负责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此我对她所做的工作和对我的关心深表感谢。她对我的一些想法很感兴趣,这使我十分感激,要知道,乐教授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有着世界范围的交往,她能认为我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有价值的,这真是我的荣幸。我慕乐教授之名来过一次中国;她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协会的主席,曾邀请我参加该协会于1999年8月在成都举行的年会。当时我和她共同主持了一个座谈小组,在另外一个小组我给出了一篇论文并发表了几次讲话。就在那次访

问中国期间乐教授又筹备了我的北大之行。在2000年的春天,我又遇到了在去年认识的几个人,同时,我还很高兴能够在乐教授和她的丈夫汤一介先生家中饮谈。

我还要感谢比较文学所所长严绍槃教授,他主持了我在北大所做系列讲座中的一讲。他还主持了为我举行的饯行宴会。就是在这次极其令人愉快和值得回忆的宴会上,教师与博士生们济济一堂,其中有些人与我的讲座有关,有些曾令我的北大之行非常愉快。

我还要感谢张辉博士,他是乐教授的一个年轻同事,我两次来北京期间,他对我照顾备至,加之他是一个很勤奋的学者,时间对他来说格外宝贵,所以我对他深表感激。与张博士谈话令人愉快,很有收获。

北大的博士生张沛起初翻译了我的系列讲座中的两个讲座,后来他和另一位译者接过了翻译本书全部手稿的工作。我几乎完全不懂中文,通过和张沛交谈,我发现他对哲学问题有很强的洞察力,并且极为注重文字的精确性,这样我就放心来了。这项工作在我看来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整部书稿不但在其哲学辩论中具有相当的“技术”性,而且就内容而言是跨学科的,所涉范围非常广泛。他们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时细致而又大胆,我非常欣赏这种严肃负责的态度。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北大遇到的热情接待。大学宾馆附近是北大教职工网球俱乐部,有几个网球场。一天清晨我驻足观看打网球,或许俱乐部主席注意到了我渴望的目光,于是就主动同我攀谈,问我是否愿意第二天来玩。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她本来要借给我网球拍,不过我可是全副

武装了来中国的。在第二天生龙活虎的网球双打中，我们虽然对话不多，但这仍不失一种最热情的交流形式。

我还要对现代中国研究所的阿克赛·施内德教授深表谢意；阿克赛·施内德教授兼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主任，他阅读了我的英文手稿之后，告诉我中文译文将会非常复杂，令我对初步的译文有了一些印象。

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北京瑞典大使馆的公使拉斯·伏莱顿先生曾邀我去使馆赴宴，他中文非常流利，是个中国通。我第二次来访时，他来北大听我的讲座，同时也是饕餮宴上的客人之一。他的热情，他为我所做的建议，以及同他进行的有趣谈话，都令我铭感于心。

吴学昭女士是一名敬业的学者与作家，近年来她用了很多时间编辑她的父亲吴宓先生的作品。她与我在北大所做的讲座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我还是要向她表示我真诚的谢意，感谢她让我感到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她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并努力在中国加以推广，我深蒙其惠，特在此对她所做的努力深表谢忱。

克萊斯·瑞恩
于华盛顿特区

目 录

序.....	乐黛云(1)
前言.....	(1)
第一章 和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1)
第二章 统一体的道德与文化前提	(7)
第三章 和平的全球基础	(16)
第四章 活的历史	(22)
第五章 共同的伦理核心	(32)
第六章 关于一致性的种种可疑观点	(40)
第七章 对历史的攻讦	(54)
第八章 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历史主义	(68)
第九章 作为标准的具体事物	(84)
第十章 普遍事物的独特表达.....	(103)

附录:

新雅各宾主义:民主制度能存在下去吗?

一、民主与雅各宾主义	(116)
二、几种冲突的民主制度	(122)
三、分散型社会的精神	(125)
四、民主与贵族式克制	(127)
五、卢梭与服从大众	(131)
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134)

七、伦理的普遍性与一致性	(136)
八、民主制度的衰落	(139)
九、新雅各宾派	(147)
十、雅各宾主义和资本主义	(154)
十一、重归道德现实主义	(164)
对“一”的信心(代译后记)	(166)

第一章 和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人类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各民族和各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危险。我们亟需深入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冲突，并且真正为之做出努力。以一种浅薄、粗疏和天真的态度来看待上述危险，从而不能及时予以解决，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人性本能地逃避痛苦的自我反省与自我矫正，这就使人们习惯于漫不经心地做出一厢情愿的打算。在西方和其他地方，都有不少人坚信科技的进步与普遍的启蒙可以减少冲突的危险，但我们只要看一看上个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血腥的一个世纪——我们就会承认科学与所谓现代观念的传播并未剪除人类自私与好斗的本性。科学昌明仅仅为人类提供了为所欲为的手段。还有一些西方人相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举措可以减少冲突。其中“民主”和“自由市场”是目前最为热门的两种解决方案。这些涉及如何增进友好关系的方案，其实怠慢了一个实际上可能更加重要的问题，即：和平相处的道德和文化前提；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流行，并且需要更有深度和分寸感的头脑。不管其他因素多么重要，人

类若无一定的意志与想像力，避免民族和个人之间争端冲突的努力仍难以取得成功。与引进技术和操作政治经济规程的倡导相比，这一认识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这表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应付新世纪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术语来讨论当前的问题：在文化上相异的民族和个人有可能和平共处吗？文化多样性一直存在，但今天新的交往手段和更多的迁移机会让不同背景的人走得更近，交往更为频繁。世界日益变小，人们急切想要找到相互调适、协同与宽容的方法。不同民族和个人和谐共处的基础可能会是什么呢？这正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问题的道德文化层面。

西方的主流多元文化论者对于人类经验是否包含道德或美学因素并无多大兴趣，但这些因素超越了特定的社团，并且有可能构成联系共同人性的纽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当前多元文化论更为宏观的哲学和历史背景。如果对人类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不但会拥有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更多实例，而且还会看到实实在在的跨越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特征。对更多的经验加以关注，而不仅限于当前重视的那些经验，我们就会找到揭示人类经验共同性的道德文化范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特定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表明存在着非主观性的、不受时空限制的世界观与自我认识。就人类口味癖好之多样性而言，道德观与美感在根本上是相同的。这种相同不仅见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亦见于更

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文化生活。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努力超越文化的界限来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同时提倡一种具有更高潜力的生活,发扬保障社会团结与幸福生活的美好人性。“人文主义”这句老话的含义就是“为培养人类最高的东西做出努力”。由于这个词语定义不一,下面将就本文所用“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予以厘清。

关于人性共同因素能否或如何调适文化的多元性,这是几百年来各派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经验中无处不在的这两个因素通过其表面上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全部人生。人们曾用过许多术语来描述生存矛盾的各个方面:一元与多元、动与静、秩序与混乱、和谐与杂乱、同与异等等。

尽管在直接具体经验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但是哲学家们却倾向于取消其中一方的终极意义而认为另一方才是现实的。柏拉图便是如此。对柏拉图来说,个别现象即所谓“多”,是变动不居的、没有意义的。人们应当尽可能回避任何特殊的、变迁的东西而投向普遍的、不变的一方。普遍性——以真善美为其不同形式——是非历史的,但是又受到历史变迁的威胁和掩盖。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否认真善美存在着恒定的标准而只承认历史的特殊性、偶然性和主观性等等柏拉图认为无价值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摒弃了高等秩序/意义的观念,他们为多样性欢呼,提倡对人际间的差异加以容忍——一句话,生命并无共同的人性核心。

这些对立的思维方式恰恰证实了美国文学学者和文

化思想家艾尔文·白璧德(1865—1933)关于“形而上的一”(metaphysics of the One)和“形而上的多”(metaphysics of the Many)的提法。这两种哲学论断分别贬低或忽视了生活中“一”和“多”这两个层面中的一个方面。它们都是“形而上”的,因为双方都不愿把各自对现实的看法建筑在直接经验之上,而是有所取舍为己所用。一与多的形而上学甚至歪曲了它们对之感兴趣的一与多,这是因为它们给予了一或多某种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唯我独尊的特性。白璧德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生活并不是在此处为一,而又在彼处变化;它给了我们一种‘变动的一’,一与变是不可分割的。”^①

我们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直接影响到

①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first published in 1919), lxxiii (emphasis in original). 白璧德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和比较文学教授,他是一个智者型的学者,对东方的思想怀有浓厚的兴趣(见以下数章),许多亚洲学生曾深受其影响,其中一些人在本国很有建树。他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包括吴宓和汤用彤。陈寅恪虽然不是白璧德的学生,但是曾经同他会过面,对他的成就大为称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其思想的影响下,转而维护中国的人文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为《学衡》期刊撰稿。最近大陆又出版了吴宓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重新又恢复了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趣,例如,出版了《吴宓日记》,吴学昭编,共十卷,(北京:三联/SDX Joint Publishing Co, 1998),《吴宓生平》,(同上, 1995),以及《文学与生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 第二版, 1996)。